

胥夷, 刘苏. 2021. 重庆下浩社区绅士化中的失所空间体验. 热带地理, 41 (3): 472-484.

Xu Yi and Liu Su. 2021. The Spatial Experience of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in Xiahao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41 (3): 472-484.

重庆下浩社区绅士化中的失所空间体验

胥夷^a, 刘苏^{a,b}

(西南大学 a. 地理科学学院; b.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 现象学着重关注人的经验问题。在绅士化失所研究领域里, 当研究视角从关注物质空间转变为空间经验时, “生活世界”成为了基本的出发点, 这体现为从“直接性失所”往“间接性失所”的转变。以列斐伏尔的“表征的空间”为基础, 围绕象征要素对失所经验展开定性分析则成为主要的研究路径。以此方法论, 对重庆市下浩历史文化社区经历绅士化凸显出的失所经验进行分析, 发现: 1) 失所经验在社区原住民、移民与游客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原住民的失所经验体现为其世代传承地方要素的丧失, 导致“存在内部性”的丧失; 移民的失所经验表现为移情载体的消失, 导致其自由生活方式的丧失; 游客的失所经验体现为彻底商业化导致其寻根体验地的消亡。2) 移民在社区中开展的文化商业活动起到了嫁接内部本真社会空间与外部消费空间的作用, 导致本真“社会空间”被中产阶级消费空间所置换。

关键词: 绅士化; 失所; 现象学; 列斐伏尔; 表征的空间; 重庆

中图分类号: TU984.1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21(2021)03-0472-13

DOI: 10.13284/j.cnki.rddl.00334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当Glass (1964)在对伦敦Islington社区的案例研究中提出“绅士化”一词后, 绅士化被普遍理解为对工人阶级与破败住房区的更新, 由此带来整个区域朝中产阶级邻里的转变 (Smith et al., 1986; Atkinson, 2000a; 2000b)。而“失所”作为绅士化造成的一个主要社会效应 (Curran, 2007; Elliott-Cooper et al., 2020), 在时空尺度上呈现出一种常态化、规模化的趋势 (刘颖等, 2018)。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 因现象学的影响, 英美学者逐渐将“失所”的关注点从物质层面转向了人的经验层面, 呈现出“直接性失所”(direct displacement)与“间接性失所”(indirect displacement)的分野。而人的经验中不仅包括了“不自觉的”普遍经验模式, 还包括在特定社会目的导向下“自觉的”偶发(contingent)经验。在地理学家Oliver (2017)看来, 这也是现象学在分析“生活世

界”中的一个突破, 因为传统现象学阐释“生活世界”时往往着眼于不自觉的“普遍”经验模式, 而忽略了对“自觉的”偶发经验的解释。那么, 当对“生活世界”的理解同时包含“普遍”与“偶发”两个层面时, 它就会体现为既是充满“关怀的场域”(field of care), 也是“令人挣扎的场域”(field of struggling) (Oliver, 2017), 前者关注扎根, 后者关注失根。而这样的突破在“失所”——作为生活世界中的偶发经验——的问题域中则同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紧密结合了起来, 呈现为高度关注“表征的空间”和“空间的实践”所构成的生活世界。由此“现象学”“生活世界”与“空间三元辩证法”三者不仅在“失所”问题域中相互结合, 更使得研究失所的学者从强调物质性的直接性失所, 转向了人之经验性的间接性失所。而本研究则试图从该辩证法中的“表征的空间”和“空间的

收稿日期: 2020-09-03; 修回日期: 2020-11-03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

作者简介: 胥夷 (1998—), 女, 四川雅安人, 本科生, 主要从事社会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E-mail) 843994868@qq.com;

通信作者: 刘苏 (1983—), 男, 汉, 重庆人, 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地理学方法论、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E-mail) matthewsu2013@126.com

实践”入手来探讨“生活世界”中的失所经验，以揭示人的地方根性因现代性而遭遇解构的过程。

1 从直接性失所到间接性失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学者着重关注物质层面的失所，如房屋搬迁、人口迁移等，缺乏对人的经验展开分析。譬如Laska等（1980）针对新奥尔良城市回归运动（back-to-the-city movement），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了绅士化引发的失所现象及其威胁，包括导致的各种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Barret和David（1984）对城市弱势群体因绅士化导致的失所威胁展开了分析；Jeffrey（1984）研究了老年人的失所现象。这些研究均着眼于人口、经济与政策方面的问题，缺乏对个体经验的探讨。随着绅士化现象在欧美大城市的涌现，失所被视为绅士化必然引发的后果（Marcuse, 1985b; Curran, 2007; Davidson, 2009）。1978年，Grier等（1980）在美国城市与住房部门的一项报告中初次界定了“失所”的概念，其内涵在于显而易见的人口迁移，原因在于绅士化过程中导致租金上涨等经济社会因素。这表明，该时期的失所研究没有在生活世界的层面对人的经验问题展开分析，对失所概念内涵的界定也局限于表面的人口迁移，忽略了看不见明显迁移现象的“间接性失所”。

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学者不断对绅士化与失所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质疑（Sumka, 1979; Slater, 2006），原因在于，某些绅士化区域中低收入群体已基本消失，人口迁移现象已不再明显（Elliott-Cooper et al., 2020），但这是否代表不存在失所？以及是否存在定量研究方法无法揭示的隐秘失所现象？（Freeman, 2005）。Atkinson（2000 a）指出，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无法测度隐秘的失所现象。McKinnish等（2010）也指出绅士化和失所之间的关系无法完全通过人口的空间迁移来测度。

到2010年前后，学者开始重新构建绅士化与失所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早在1985年，Marcuse（1985 a）就已将失所概念的内涵朝着“间接性失所”进行了拓展，其中包括2个维度：“排斥性失所”（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与“失所压力”（displacement pressure），它们不属于之前Grier等（1980）界定的人口迁移的物质性失所。这两个维度的共同点在于：在一个特定的绅士化社区内，尽管没有出现明显的人口迁移现象，但失所已经存在。比如，“排斥性失所”关注因房东人为提高租

金，导致同等收入水平的房客被排斥在某社区之外；而“失所压力”关注因社区周边设施的绅士化而引发的居民心理压力，是一种“不在家”的感受（Elliott-Cooper et al., 2020）。所以，不存在人口迁移现象并不代表不存在失所（Davidson, 2009; Shaw et al., 2015）。

由此，Davidson（2009）进一步明确了现象学对失所内涵的奠定，即间接性失所概念建立在现象学的基础之上，而列斐伏尔“表征的空间”中所蕴含的“经验”维度是对间接性失所开展分析的重要切入点，因此需要着重分析地方的社会建构在人的经验层面所造成的影响。列斐伏尔继承了梅洛庞蒂的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与空间之间的非二元关系，它们均交织在身体知觉之中，因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与现象学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Eden, 2020）。同时，身体知觉通过象征要素作用于“表征的空间”以此同“空间的表征”形成了对立关系，所以列斐伏尔尤为强调对空间中的象征要素展开分析，以揭示人的经验问题（Eden, 2020）。

2011年，Mazer等（2011）重申了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社会空间”属于“表征的空间”范畴，包含了象征要素所指向的社会阶层，即因社会阶层的差异，人们对社会空间的体验也不尽相同。由于绅士化被普遍理解为阶层替换的过程，那么对指向不同阶层的象征要素展开分析，则能有效揭示出间接性失所蕴含的人类经验问题。

此外，在针对失所经验的研究方法选取上，Slater（2006）指出定性研究方法需要被广泛采用。在后来采用定性方法针对失所经验展开分析的个案研究中，学者通常会对与地方要素相关的地方感展开调查。Mazer等（2011）在多伦多西区的租赁户个案研究中发现，失所经验中的羞耻感、不安全感对相关人群的社会融入构成了严重障碍，而这些经验均同邻里环境中的象征要素联系在一起，如时尚店面、咖啡文化、艺术画廊等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生活环境。Shaw等（2015）在对墨尔本两个社区中的商店、会遇场所（meeting places）、社会关系与政府管理4类要素的绅士化过程展开调查时指出，它们的变化会导致失所感的产生。Atkinson（2015）对墨尔本和悉尼的租赁户展开调查时也指出，在真正出现直接性失所之前，地方要素的变化会导致人的内心产生失所感；这些要素包括新的消费与休闲景观的出现，邻里商业模式的变化，建筑物外观的改变，房东人为导致室内装修的变化，他把这种失

所称为“象征性失所”(symbolic displacement)。此外,间接性失所的个案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探讨租赁过程,而是拓展到了更多的领域,如Butler等(2013)在对东伦敦教育性失所的案例分析中发现,存在对弱势群体构成威胁的“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现象。同时,不少研究者还指出,失所不仅会引发痛苦情绪,甚至与创伤后应激症(post-traumatic stress)的发生也存在关联(Fussell et al., 2014; Crawford et al., 2017; Pain, 2019)。

可见, Marcuse (1985a) 最初提出的间接性失所概念在不断与新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产生联系,其内涵更因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与现象学嫁接起来,由此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视角:以现象学为视角,用定性的方法分析特定地方“社会空间”里的象征要素,以揭示失所经验在具体地方中的呈现方式。

2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城市快速扩张和城市更新并行的时期(何深静等, 2010),计划经济时代持续衰败的城市内城也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过程(刘颖等, 2018),表现为城市物质空间的升级和阶层的替换(何深静等, 2010),即以新建绅士化为其主要形式来推动城市空间的重构(张平宇, 2004; 何深静等, 2008)。由此,城市空间的大量地方性要素被置换,引发了明显的失所现象。失所会造成社区感的破坏(Marcuse, 1985b),折射出城市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维度(刘颖等, 2018)。

本文选取的研究区域是重庆市南滨路下浩社区,该社区经历的绅士化过程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历史文化古迹为基础的旅游绅士化(赵玉宗等, 2006)。旅游绅士化的概念最早由Gotham (2005)提出,意指通过休闲娱乐和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

该社区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东南,西毗长江,覆盖东水门大桥附近及其北侧区域(图1),历史文化古迹十分丰富。下浩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清乾隆时期,当时已形成街市,是重庆长江南岸最主要的老街之一。至乾隆时期以来,一批重要的近现代民间建筑在下浩陆续出现,如乾隆年间修建的觉林寺报恩塔,道光年间修建的慈云寺,20世纪初期修建的熊家大院等。同时,因下浩社区是重庆市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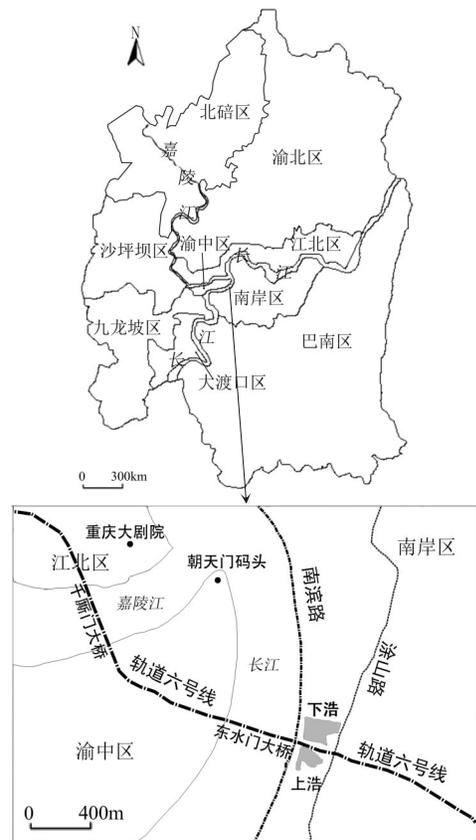


图1 重庆下浩社区区位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Xiahao Community in Chongqing

的传统码头街区(黄玺, 2007), 1891年开埠后,英国商人立德乐因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天然良港条件,在此开设猪鬃加工厂(重庆市南岸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随后,不同国家纷纷在下浩开设使馆、俱乐部、洋行,出现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该区域呈现出因殖民商业的涌入而产生的绅士化现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躲避日军对渝中半岛的轰炸而涌入的难民使得下浩人口大增(重庆市南岸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该时期的绅士化现象不但未因战争而消退,反而沿袭了开埠以来的工商业传统,社区内开设了大量工厂与银行,形成了猪鬃、皮革等制造业与金融业的集聚。同时,美国舰艇水兵为躲避日军轰炸也驻扎于此,开设酒吧(沃尔夫冈·卡佛岗, 2014)。

解放后,下浩的制造业只持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原因在于城市产业升级与制造业衰落。与此同时,下浩周边区域却迎来了商业化与绅士化过程,下浩逐渐沦为了一块“城中村”飞地。直到2014

年，艺术家看中了下浩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始经营茶室并从事摄影创作与纪录片录制等文艺活动，又在网上发起“为老街修建街心花园”的募捐活动。该行为进一步引发了零售业的绅士化（Hubbard, 2017; Elliott-Cooper et al., 2020），对游客产生了吸引力。同年5月30日，下浩所在的“慈云寺一米市街—龙门浩街区”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为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动迁^①工作启动。2016-06-10,《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题为“下浩老街：长江南岸的旧重庆”一文，*China Daily*上亦发表题为“Under The Young's Watch and Protection”一文，2篇文章均表达出对下浩的怀旧之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当时，下浩所在的南滨路已基本完成绅士化过程，作为大量中产阶层人士居住与消费的区域，密集分布着高档住宅小区与商业设施，如阳光华庭、帝景名苑、海棠晓月等小区，以及喜来登、东苑1891等豪华商业场所。而下浩却因动迁相对缓慢，沦为了一块古旧的城市飞地。2017年5月，下浩动迁进程不断加快，目的是为了配合周围已成熟的绅士化空间，使其本身也尽快成为一个供中产阶层消费和观光的场所。这印证了Elliott-Cooper等(2020)的观点：“第一波绅士化会潜在地触发第二波绅士化。”2018年5月，绝大多数居民完成了动迁。由此可见，艺术家引发的下浩绅士化与政府的动迁规划于2014年同时并行。换言之，下浩作为一个既定的动迁区域经历着绅士化的过程，动迁在4年内渐进式地开展，2017年进入高潮。

总体来看，下浩社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汇集了民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和网红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其旅游绅士化模式实际上属于塑造近现代风貌型的消费空间。张京祥等(2009)指出：国内近现代风貌消费空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资本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其高明之处是将“近现代风貌区”这一纯粹的物质空间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作为商业消费的卖点符号；它隐喻着强行推动空间绅士化的过程，也是非历史保护的波普化行为。上海新天地、南京“1912”、宁波老外滩均是这类典型的案例。因此，这类空间改造的特殊性体现为空间的物质建筑被保留下来，而其承载的功能、意义与人口却因消费主义的侵入而经

历着根本的置换。该过程引发了突出的失所现象，使得本案例具有了比较突出的典型性以供开展绅士化-失所（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问题的研究。后文将着重关注下浩的3个社会群体：原住民、移民和游客在绅士化与动迁过程中的失所经验。

2.2 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空间的实践”这一元起到连接“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的桥梁作用。而在地理学家Gregory (1994)看来，“表征的空间”体现为自觉地与“空间的表征”相对立，其途径为日常生活主体对象征要素自觉地感知与使用所构成的“空间的实践”过程，它是社会关系的“底面隐秘再现”（Lefebvre, 1991）。在这个讨论脉络里，列斐伏尔提出了可概化为感知（perceived）、构想（conceived）和生活（lived）的社会空间分析三元组（王志弘，2009）。为分析案例地日常生活主体对社会关系的表征，进而揭示出间接性失所的经验模式，本研究结合Low等（1992）对“依附”问题开展分析的3个维度——认知、行为与情感，在感知与行为层面中揭示案例地“空间的实践”；由于“构想”这一元对应于“空间的表征”，因此不属于本研究讨论的重点。

笔者分别于2019年4、6与8月进行了为期共36 d的实地调研，12月初开展了1 d的实地回访。调研期间，下浩社区已基本完成动迁，仅剩3户人家。笔者共联系到17位与该社区相关的人士（表1）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包括7位原住民、3位移民和7位游客。其中，7位原住民在下浩生活平均时长为52 a，祖辈均是下浩居民，他们不仅熟知下浩历史，其家族史、生命史也与此地水乳相融；3位受访的移民是下浩的第一批移民，也是民间自发层面对该地进行文化宣传的主要角色，他们直到下浩全部动迁才逐渐搬离；受访的7名游客多为四川与重庆籍，其所生长的文化土壤令其对下浩所代表的老重庆文化存在怀旧与认同；进而，访谈对象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便于从每个群体中发现各自具有的间接性失所的经验特征。每次访谈约在0.5~1.5 h。访谈主要侧重三方面的问题：1) 3个群体对下浩的地方要素分别具有怎样的认知表征；2) 3个群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如何体现出来；3) 在面临失所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伤经验（trauma experience）分别具有怎样

^① 邱建华将displacement翻译为“动迁”，与“失所”是同一个概念。然而，本研究中的“动迁”只指“直接性失所”，而不包括“间接性失所”。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d respondents

编号	姓名昵称	年龄/岁	居住时长	身份	职业	访谈时间
01	熊先生	72	72 a		退休	2019年8月
02	张先生	58	58 a		诗人	2019年8月
03	夏先生	70	27 a	原	餐饮店老板	2019年8月
04	王先生	68	67 a	住	杂货店老板	2019年8月
05	陈先生	47	46 a	民	餐饮店老板	2019年8月
06	张女士	45	44 a		餐饮店老板	2019年8月
07	陈女士	71	50 a		退休	2019年8月
08	吴先生	30	2.5 a		园艺师	2019年8月
09	李女士	43	4 a	移民	茶室老板	2019年4、6、8月
10	周先生	27	4 a		摄影师	2019年8月
11	孙先生	41	5 d		书店老板	2019年8月
12	赵女士	50	2 d		公务员	2019年8月
13	谢小姐	22	1 d	游客	学生	2019年10月
14	赵先生	22	1 d		学生	2019年10月
15	郑先生	36	1 d		公务员	2019年10月
16	游小姐	27	1 d		白领	2019年10月
17	容小姐	23	3 d	游客	学生	2019年10月

的特征，其与地方要素存在怎样的关系。

在实地调研中，笔者于8月份在下浩附近租房30 d，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法以观察附近居民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结合访谈法以移情 (empathy) 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动迁之前下浩社区的生活世界，并借助包括地方志文本《南岸区志》《南岸区地名志》、史学文本《重庆开埠史》、影像文本《昨夜西风——重庆开埠影像志》《陪都重庆：大轰炸下的抗日日志》和回忆录文本《重庆往事——一个人的晚年回忆》等与下浩有关的文本材料展开分析。

3 认知维度

间接性失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把时间因素融入其中展开思考 (Sakizlioglu, 2014)；列斐伏尔尤为强调“表征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维度，以此构成“社会空间”，因此需要对社会关系的特征展开分析 (Mazer et al., 2011; Sakizlioglu, 2014)。由于象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居民知识的载体，也是活动的组织者和记忆的源泉 (凯文·林奇, 2001)，所以通过访谈法对环境要素的历史变化展开考察，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得以组织的过程，而这些缺失的象征要素则承载着人的失所经验。本研究从物质环境认知与社会关系的认知两方面入手对3类社会群体展开调查。

3.1 原住民的认知表征与地方要素

3.1.1 原住民的物质环境认知 接受访谈的共7位原住民，其中5位居住在下浩正街，2位居住在临近的米市街，因其居住地的略微差异，对下浩地方要素呈现出不同的认知。

在回答对下浩“印象最深的建筑物”时，住在下浩正街的3位原住民提到了“熊家大院”，比如其中的夏先生就讲述了熊大爷曾在重庆商界叱咤风云、在社区乐善好施的故事，认为熊家大院代表了下浩的袍哥文化与码头文化，是下浩不能忘却的记忆。除了“熊家大院”外，还有其它地方要素构建起了原住民的环境认知。陈先生认为位于下浩正街入口处的“贞节牌坊”（于文革期间被拆毁）也是其标志性建筑物。张女士认为“下浩正街”本身就是最能代表下浩的地理事物，而她们家连续4代人在此经营的“春卷”店也最具代表性。王先生认为下浩的诸多古迹如“报恩塔”“觉林寺”“禹王庙”和“望耳楼”等传统宗教建筑是下浩标志性的地理事物。

居住在米市街的原住民则提到了不同的地方要素。张先生提到他家附近的“穿穿房子”（穿斗式木结构建筑，即吊脚楼），以及米市街附近的“小溪、石桥”和历史建筑“报恩塔”。陈女士提到她家附近的“周家湾吊脚楼”（于2010年拆除）、位于米市街的“洋行”以及位于长江边的“枣子湾水兵馆”；她还回忆起青年时代见到的米市街和周家湾商贾云集、热闹非凡的景象，认为这些建筑最“原汁原味”，能代表下浩繁荣的历史。由此可见，原住民的认知要素大多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建筑和与自身成长经历有关的场所。

在问及对下浩的整体印象时，原住民多讲述了几十年的经历，在对空间的描述上也超出了社区的范围。例如，在谈及社区的服务业时，陈先生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在下浩正街开设的KTV、台球馆；陈女士回忆了80年代附近周家湾的娱乐场所；王先生谈到了社区以外涂山等地方的基础设施。总体来看，原住民对社区的感知呈现出时空的广度，历史的变迁与周边的地理环境均一起构成该群体的认知，该特征是移民与游客2个群体所不具备的。

3.1.2 原住民的社会关系认知 在描述下浩的社会关系时，原住民频繁地表达出“人情味浓厚”“街坊邻居不分彼此”的邻里关系，在他们的认知里，下浩的人际关系相当亲密。旅游绅士化则对此认知造成了负面影响。原住民普遍感到安宁的生活被游

客打扰，亲密的人际关系也逐渐疏离。

“有些游客讲究环境卫生，有些不讲究。比如有些乱丢垃圾；有的游客看到种得有花花草草的，就经常去采。”
——陈女士

“以前吃饭经常串门，隔壁邻居经常一起吃饭、帮忙，包粽子的时候大家一起包，过年挂香肠也大家一起挂。新房子一搬，什么都没有了。”

——张女士

同时，当下浩成为旅游网红地以后，越来越多的原住民从事商业经营，如开店、出租房屋、经营民宿，社会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与冲突。

“下浩火了很多人就做生意了嘛，有些人就开始算计了。你做这个，就有人跟着去做，很多人就产生了经济纠纷，这种经济纠纷把以前的感情都改变了。”
——陈先生

“我好心好意地去教他做锅贴生意，把他教会了，他反倒防备起我来了。”
——夏先生

绅士化过程使原住民逐渐丧失了情感依附的本真人际关系，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关系出现疏离，这些均构成了原住民的间接性失所经验。

3.2 移民的认知表征与地方要素

3.2.1 移民的物质环境认知 本研究中“移民”指2014年以后入驻下浩的群体。他们中有的人从事艺术创作，有的进行历史与口述资料的搜集与宣传，也同时从事商业经营。移民普遍具有文艺气息，其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原住民，是最早一批引发下浩绅士化的群体。该群体迁入下浩的原因在于看中了下浩宁静传统的生活方式、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租金。但由于动迁规划的限制，类似的迁入者逐渐减少，因此数量不多。

在谈到“印象最深的建筑物”时，茶室老板李女士提到了“永兴洋行”“报恩塔”和“熊家大院”，认为“建筑是历史的载体，通过了解建筑本身就可以知晓过去发生的事”。她认为“熊家大院”是下浩最具代表性的事物，代表着下浩深厚的文化根基以及“尚文重商”的传统。园艺师吴先生则认为“望耳楼”的建筑形制能代表“老重庆的风格”。摄影师周先生认为“报恩塔”是下浩的标志性建筑；此外，店铺“花生大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因为该店三代人在下浩经营炒货，已成为下浩的传统，其电话经商的独特方式也体现出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在谈到对下浩物质环境的整体印象时，李女士认为这里是“熟悉的城市中最截然不同的一面，这

一面代表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舒适且能唤起乡愁。”周先生也认为这里是传统且舒适的地方。可见，“乡愁”是移民选择来此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从事商业经营的文化基底。

3.2.2 移民的社会关系认知 就下浩的社会关系而言，3位移民频繁地用“友好”来形容。因职业不同，他们对自己与原住民之间关系的认知存在差异。李女士因经营茶室建立起较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其主要的交往场所是自己的茶室。社会关系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同样从事商业经营的原住民和离茶室最近的街坊邻里，如“猴哥米线”的老板，这些人是帮助李女士融入下浩的关键人脉。另一类是游客，尤其是与李女士长期保持联系的游客，他们社会背景广泛，包括知识分子、留学生、文艺工作者等。李女士还认为自己的茶室是“炒火下浩”的主要因素，也为其他商铺带来了客流量。而未从事商业经营的吴先生和周先生与原住民的主要交往场所是当地的店铺。除了与邻居有较多的来往，他们并没有很深入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子里。

“居民一般都是在黄葛树下、楼下的石凳子上乘凉聊天，或者是在麻将馆、茶馆里休息。但是我一般就只会吃饭买东西的时候和他们聊聊天，因为我毕竟不是当地人嘛。”
——吴先生

周先生尽管感到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但是他却认为：“最好还是让彼此（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保持一种友好又互不打扰的状态”。事实上，这种状态的保持是为了能够从事安静创作。他还认为下浩区别于其他商品房小区的自然且自由的生活方式是触发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同时，当地原住民家庭作坊式且随性自由的商铺经营模式也是移民常体会到的原真生活。像豆花鲫鱼馆会冬天“放寒假”夏天“放暑假”；老太婆春卷“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花生大王”长期不开门，而只是在门上挂个电话号码，欢迎随时拨打。这些都迥异于现代商业效益至上的观念。

此外，移民也特别注重与某些具有文艺气息的原住民建立人际关系。

“下浩出诗人，菜市场卖菜的两口子，看起来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结果有一天拿了首诗让我帮他看看能不能发表。”
——李女士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娃儿在二楼拉小提琴，他下面就是下浩的菜市场。这一幕让我印象很深刻。”
——摄影师周先生

然而随着下浩游客的增多，移民普遍认为宁静

且自由的生活气息被打扰。李女士认为,茶室原本宁静的气氛常被“拍照打卡”的游人所破坏,经常光顾茶室的原住民也减少了。吴先生指出,游客的增多对不从事商业行为的住户而言是一种困扰:“游客会大声喧哗、乱扔垃圾,并且在未经主人同意的情况下就闯进别人的院子里拍照。”

同时,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张力:

“那些住家的阿姨看到我生意好就开始说我坏话,就是那种嫌人穷又怨人富的心理。有些住在那种破败的公房,想快点搬的,总觉得我把这条街炒火了他们就搬不了了。”——李女士

因此,本真生活气息的减弱与人际关系的变化,均是移民具有的间接性失所经验。

3.3 游客的认知表征与地方要素

游客是下浩旅游绅士化的主要参与者。尽管下浩目前已基本完成动迁,但其已具备的知名度和周边区域成熟的商业氛围依然会吸引不少游客。本研究采访的7名游客均在下浩停留1 h以上,包括3位曾多次造访下浩的重庆籍游客,这样就保证了研究对象对下浩有比较详细的认知。

通过访谈发现,7位游客对下浩的总体印象是“老重庆”“原生态”和“记忆中的家园”。其中2位重庆籍游客(70后)孙先生与赵女士均认为下浩“充满了人文气息”,也是他们“儿时的记忆”“在这里找到了乡愁”。四川籍游客赵先生与容小姐认为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原生态生活方式”。

在问及下浩的标志性建筑物时,7名游客中有4名提到了网红茶室“冻绿房”。赵先生提到“冻绿房”中用旧家具布置的“下浩居民生活情景纪念馆”,觉得从纪念馆里就能感受到这里传统的生活方式。孙先生认为最打动他的是“冻绿房”与老街的和谐共生,因为“这代表了一种现代文化与传统气息的融合”。河北游客郑先生认为下浩正街的“黄葛树”与“石板路”是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因为“它们能够代表整个老重庆”。

总体来看,下浩对游客的吸引力在于传统与古旧的氛围所唤起的对记忆家园的怀旧(nostalgia),因此他们来到此地践行一种寻根的体验,而非一种单纯的商业消费。钱俊希等(2015)在针对“藏漂”的研究中指出,对本真地方性的体验“深深地嵌入在逃离现代性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之中。”但通过访谈发现,游客对下浩的文化其实缺乏深刻地挖掘,而主要通过移民建构的消费场所来实践。例

如,赵女士说自己特别喜欢以“永兴洋行”为背景拍照,但并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所以,游客是被移民的文化商业场所嫁接到了本真的地方体验之中,起到了连接内、外两空间的桥梁作用。正是这种不断嫁接的机制才使得下浩始终处于旅游绅士化的过程中。

在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中,游客与另外两个群体一样都体现出对当地亲密人际关系和浓厚人情味的认同。然而,若以Relph(2008)的3个“内部性”来透视,则可观照出他们各自认同的特征。原住民体现出了“存在的内部性”(existential insideness)特征,即通过不自觉的日常关系去践行一种理所当然的地方性;移民体现出了“移情的内部性”(empathetic insideness)特征,即他们是在自觉地体验着当地的社会关系,挖掘其中的价值以融入到自身的艺术创作和商业经营之中;游客的认同具有“行为的内部性”(behavioral insideness)特征,他们通过对本真人际氛围的大致体会形成了对当地的认同。

4 行为维度

4.1 原住民的行为与地方要素

“社会空间”同时强调日常生活与物质载体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因此地方性要素在被居民日常行为生产的同时,也反过来组织着居民的日常行为。在下浩,菜市场、日用品超市、商铺、银行、诊所与学校均是组织居民日常行为的基本要素,而下浩正街则是居民最重要的社交场所。陈女士说,下浩自古以来就是粮食等农产品集散地,近郊的农民都喜欢到此卖菜,其重要地标“米市街”由此得名。可见日常行为与地方要素的意义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

同时,在重大节日期间,下浩周边的象征要素(如涂山)也都因原住民的行为被组织起来共同构成其地方性。

“春节期间要到庙里去烧香,大家要到涂山寺去,就要经过下浩。沿途有好多小摊小贩,卖凉粉凉面的、卖洋芋的、卖甜大蒜的,还有卖老荫茶的。到涂山寺经过回龙墙,那里有一条河沟,叫打儿石,那里面有一条“小白龙”,有小朋友就捡起石头卖给那些香客,他们打到龙头就生儿子,打到龙尾就生女儿。”——陈先生

但通过访谈了解到,在旅游知名度不断提升期间,不少外部官方团体来下浩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在问及“下浩新兴艺术文化节”和“老街志愿保护活动”时，有3位原住民对这类活动完全不知晓，其他4位虽知晓但并不关心。这说明从外部植入的官方文化活动还无法成为构建原住民行为的要素。有学者在对广州小洲村的研究中发现，小洲村的本地村民与艺术家的地方认同感在本质上还处在一个消极的割裂与断层状态（朱竝等，2012）。这表明“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的象征要素只属于本群体的行为，而异质要素的植入，只会造成群体间的消极断裂。

4.2 移民的行为与地方要素

通过访谈得知，组织移民日常行为的地方要素包括下浩的菜市场、杂货铺、熟食店和网红店，同时，“猴哥米线”“老太婆春卷”“豆花鲫鱼”等原住民世代经营的知名餐馆也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此外，移民还会有意识地庆祝西方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会亲手制作“圣诞树”与“南瓜灯”。这类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但对原住民吸引力较低。同时，移民还是下浩文化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例如，茶室老板李女士组织过“创意集市”与“告别诗会”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与原住民参加。他们甚至也是外来官方艺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如受访的3位移民都参加过“下浩新兴艺术文化节”。可见，移民的文化行为乃是嫁接社区内、外空间的桥梁。

4.3 游客的行为与地方要素

游客在下浩的体验对象主要是沿街的茶馆、店铺等商业场所，尤其是网红场所，同时还包括开埠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其目的在于感受老街的氛围，同时借助网络分享至外部的社会空间。

“饿了就在这里吃饭，这里居民自己开的小店，感觉还不错，干干净净的。……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走一走老街，体验一下以前的记忆；还有就是这些建筑，居民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体验到了，我就发发朋友圈，好多朋友都问我这是哪里，我就告诉他们。……主要是还要来看看冻绿房，然后在街上也要拍拍照，因为那些米行、洋行，都是开埠留下的东西，其它还有一些我都不记得了。这些建筑都是留下来的印记呀。要看开埠文化就是要看这些。”

——孙先生

“我觉得比较好吃的是这里的锅贴和毛哥米线，还有那个鲫鱼，他们都是原住民经营的。当年，原住民看到这里的游客多了，就开始摆摊了。但我觉得这些生意又不是刻意为我们提供的，而是需要我们去体验。就是说，我们自己来，自己在这里找一个各自喜欢的东西来体验。比如说，你喜欢人文的，就多和人交流，你喜欢摄影，就可以去摄影，你喜欢吃，那你就主要去吃。如果是刻意提供的那种，就像一些商业气息很浓的地方，我去一次就不想再去了。……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老街，重复地来，来多了，还可以和这里的人熟起来。”

——郑先生

从以上访谈可以看出，体验下浩的本真性是游客的主要目的。而其本真性不仅蕴含在历史建筑和小摊小贩交错混合呈现的地方气息里，还更体现在此地的非商业主义特征给予游客的自由自在的感受里。与其说游客来此是为了消费某几处商业场所和文物古迹，还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沉浸在这些商业、文物和居民共同营构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里。而这也正体现出Relph（2008）所谈到的“行为的内部性”特征：“行为的内部性牵涉到一种刻意去关注某地外观的状态。……当人们出入某地，或穿梭于各个地方的时候产生出一系列景象，这是一种不断期待又不断展露出来的景观，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将各个静态的地方与地方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物相互连接的方式和地方的外观物理特征在人们的地方经验里提供了独特的地方认同，而人们是作为行为的内部者去经历这些地方的。”

而当游客以网络（如朋友圈）的方式分享至外部的社会空间时，外部社会空间的人士则可能以“间接感受的内部性”（Vicarious insideness）^②参与到下浩这一地方感的构建之中；与此同时，下浩也被外卷到了外部社会空间对其意义的不断诠释之中。

正因为游客的“行为的内部性”所具有的外卷特征，外部官方机构植入的文化活动也就成为他们积极参与的对象。比如，7位游客中有4位都参加过“下浩新兴艺术文化节”和“老街志愿保护活动”，并认为下浩应多举办这类活动。

对比3类群体的行为特征，可以发现其行为均是以自身地方性知识为背景而组织起来的，由此印

^② “间接感受的内部性”是Relph（2008）提出的4种内部性中最弱的一种，指：通过二手的方式，或替代性的方式去经历一个地方，也就是不必真正到访一个地方，但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是对一个地方的深度感受。

证了林奇(2001)的观点:景观是个人行动的参照架。然而,由于3类群体对地方性知识进行建构与获取的方式存在差异,其行为组织也具有各自的特征。首先,原住民的行为由景观的历史内涵、风俗传统和经年累月的日常经验组织起来,构成了地方本真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民的行为由本真的地方知识与商业经验共同组织起来,起到了嫁接社区内、外空间的作用。换言之,通过对本真地方文化的挖掘,适当结合官方机构的宣传机制,移民的行为促进了现代消费文化在下浩的“空间生产”过程。游客的行为则是以移民构建的消费场所提供的机会来实现对本真文化的暂时体验。

5 情感维度

5.1 原住民的情感表征

作为“生活世界”中的偶发经验,“创伤经验”成为原住民情感表征里的显著特征。该部分着重分析3个群体的情感特征和因动迁产生的创伤经验。

林奇(2001)指出,地方要素能传承某个群体的历史与记忆,并使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建立起情感的安全关系。在下浩,码头、工厂与店铺是融于原住民家族史里的基本地方要素。通过访谈得知,有3位原住民曾数代在下浩从事皮革贸易,另有3位从事着四代传承的餐饮业,有6位其家族成员都曾是此地工厂的职工。可见,原住民的家族史都铭刻在了地方要素之中。

“安家在那里(下浩)是因为三几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外婆在涪陵是童养媳,她的哥哥们就把她偷出来到了重庆,就在下浩针织厂工作,就在这里立了足。后来又自己出来做豆花饭,我现在也是传承她的。”
——陈先生

“我父亲是湖北那边的“下江人”,抗战的时候就迁到这边来,跑码头做皮革生意,后来就在这边(下浩)买了房子,就把家安在这里来了。”
——张先生

“19世纪末我外公外婆就来到了下浩,成为猪鬃厂的技师。我母亲就在下浩出生,而我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武昌逃难来到下浩的。”
——王先生

然而,2017年的动迁加速过程让原住民对下浩的依恋强烈地流露出来,形成一种明显的创伤经验。

“现在住进小区进屋就关门,就包括现在一层楼的人都不认识。说舍不得的话,就是那种乡情今

后是没得了。”
——王先生

“当然还是喜欢下浩,但是下浩今后就变成商业街了,就不一样了,要的就是那种(老街坊的)感觉呀,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感觉了,下浩老街应该多留几家老住户。”
——陈先生

“实际上,我自己比较念旧,肯定还是喜欢原来的老地方,虽然原来的环境差些,但是毕竟在那里几十年了。”
——夏先生

动迁加速之前,原住民的失所经验以一种渐进且不彻底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人际关系的疏离与生活氛围常被游客打扰;而加速动迁的过程则以一种连根拔起的方式彻底摧毁了原住民日常生活所依附的地方要素,由此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创伤经验,这是物质补偿所无法弥补的。Elliott-Cooper等(2020)甚至指出,经济补偿完全无法弥补这样的创伤;因为人们对过去家园的记忆是不会消失的(Jones, 2015)。

“既愿意搬,也不愿意,愿意就是说能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不愿意就是说舍不得那种乡情,今后是没得了。”
——夏先生

5.2 移民的情感表征

通过访谈发现,移民的情感表征主要体现为以本真地方的日常生活为载体,表达出对自由生活方式的欣赏与依恋。

“我在下浩的生活是独立自由的,下浩的房子是传统街巷布局,那种格局一栋房子就是一户人家。我在那个空间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打扮自己的家和店铺,种种花,喝喝茶,出门遛遛狗,这是住在小区十几层楼的人办不到的,同时它也不像小区那样是封闭的。”
——李女士

“我在下浩的生活是很惬意的,我在下浩的家是很有生活气息的,养一只金毛、一只猫,三五朋友来了,聊聊天,喝喝茶,晒晒太阳,就像退休一般的生活。”
——吴先生

尽管,移民的文化商业行为是造成下浩旅游绅士化的主要机制,然而该群体对动迁和彻底的商业化则持反对态度,因为这意味着其情感载体的消亡,由此创伤经验得以呈现。

“我觉得这是一件破坏性的事情,它是对下浩的一种彻底破坏。离开下浩后,我更加怀念以往住在下浩的自在。”
——李女士

“我还是更喜欢下浩,因为他给人自由生长的感觉。今后的下浩有的只是打着文化幌子的商业包装,这让人痛心。”
——周先生

5.3 游客的情感表征

动迁使下浩丧失了本真性，而践行本真体验场所的消失促使游客的创伤经验呈现出来。

“我觉得下浩是中国很多老城区的缩影，中国的很多老城区都面临着相似的命运。如果是真的关心下浩的话，还是挺让人心痛的。” ——容小姐

“还是希望它能保留原住民，毕竟有人才会有灵魂，如果拆迁不能保留原有特色，我觉得很遗憾。” ——赵女士

总体来看，三类群体间接性失所的情感表征存在各自的特征：原住民的情感依附于同自身生命史与家族史有关的丰富的地方要素，动迁使得记忆载体彻底丧失；移民的情感依附于整体环境所具备的自由生活气息，动迁使得该生活方式不复存在；而逃离现代都市生活，践行本真体验场所的消亡引发了游客的创伤经验。尽管单纯就文化消费场所而言，仍有其他场所可以为游客提供消费需求，但下浩这个地方本身却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游客的创伤经验表现为对独特地方本真性消亡的一种惋惜。而地方的本真性也正是游客从事消费的根本驱动力，而非单纯以商业本身为目的。

6 结论与讨论

下浩绅士化失所经验的内在机理如图 2 所示。

在近几年城市旅游绅士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古旧社区，下浩经历着旅游绅士化与动迁的过程，其背后的机制在于两方面：其一，人的寻根体验与现代消费需求；其二，城市的土地资本驱动。而从现象学视角出发对间接性失所经验的分析表明：1) 原住民的失所经验在旅游绅士化的初期阶段就已体现出来，表现为人际关系的疏离与日常生活氛围的被打扰；而在加速动迁阶段，当日常生活所依附的地方要素彻底丧失时，则呈现出明显的创伤经验。2) 作为外来租赁户的移民群体是造成社区旅游绅士化的主要原因，即他们对文化商业空间的生产起到了嫁接外部消费文化进入社区内部“社会空间”的桥梁作用，导致其自身与原住民共同经历着间接性失所。3) 游客作为旅游绅士化的消费主体在社区内部对消费空间的使用，助推了社区本真“社会空间”被置换，最终无法真正满足其对本真场所的追寻。

在中国城市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空间已具备了高速的流动性，大卫·哈维的“时间消灭空间”已成为普遍的现实。然而，下浩社区的慢节奏生活则呈现出前现代的意味，这样的地方也往往具备家园的意象 (image)。Tuan (1977) 曾言：空间意味着自由与开放，而地方意味着闭合与安全，是价值的中心。在 Tuan 的诠释中，空间其实被赋予了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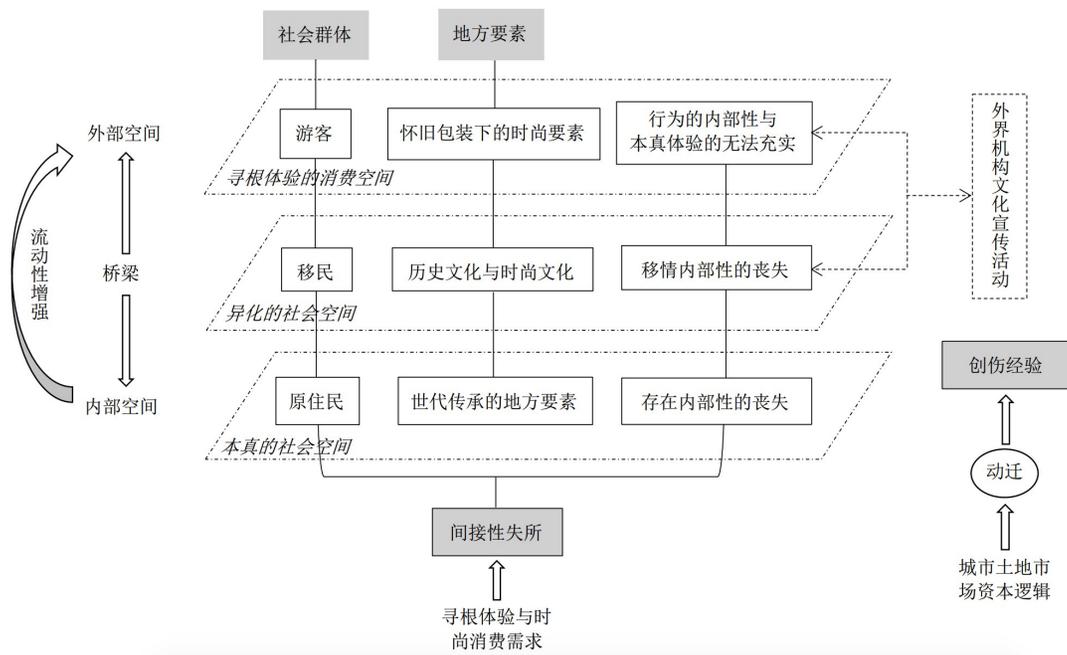


图2 下浩社区绅士化-失所的机制与过程

Fig.2 The Mechanism of Gentrific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 as a Process of Xiahao Community

的流动性,而地方则意味着非流动性,是身份认同的源发之处,也是家的所在。所以,在此语境下,雷尔夫所强调的本真性亦蕴含在了地方而非空间之中。莎伦·佐金(2015)在谈及本真性时也指出其特征在于一生之久的扎根与原初性,而非被资本与消费主义解构后的无地方性。下浩这一微观案例则浓缩地呈现出此语境下空间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现象学回应地方之根消亡的问题由来已久。地方在现代性的处境下,外部连接性会不断增强,地方的本真性会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与解构。就下浩而言,外部连接性的增强体现为践行本真地方体验游客的增多,这恰恰成为解构地方本真性的主要原因,因而被消费主义浸淫的“本真体验”同“本真性”之间就构成了一对矛盾的张力。就像钱俊希等(2015)在研究藏漂的过程中指出,过多的游客只会冲击藏文化的原真性(authenticity)。而诸多曾经具备本真性的地方,像丽江、凤凰等也都因践行本真体验游客的涌入而遭遇了本真性的解构。

在现象学的观照下,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理论关怀始终落实在人本身。Tuan(1971)曾提出地理学是人的一面镜子,能揭示出人类深层次本能的观点,指明了人才是环境的主体这一核心要旨。那么,下浩的空间演替事实上折射出人性被现代性所异化的3个层次,即原住民、移民与游客分别代表了异化由浅入深的3种程度。正如Elliott-Cooper等(2020)指出,失所是去除人主体性(de-subjectification)的一个过程。所以下浩的空间演替本质上是本真之人被异化之人所置换的过程,此过程在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二元冲突中普遍存在。那么,以此为背景,Relph(1981)于上世纪80年代所提倡的需要在人性中重新唤起“以谦卑之心尊重环境”(environmental humility)的倡议似乎才体现出了特有的价值与意义。此概念强调应尊重地方的独特性,即在保护与发展某个地方的同时,需尊重地方本身的特质和它存在于世的权利,同时还要认识到,一个地方的独特景观始终是居民希冀与梦想的体现。那么,如何将此观点落实到具体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之中,如何在中国制度语境下同地方政府的角色思考结合起来,则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tkinson R. 2000a. Measuring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 Greater London. *Urban Studies*, 37(1): 149-165.
Atkinson R. 2000b. The Hidden Costs of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 in Central Londo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5: 307-326.
Atkinson R. 2015. Losing One's Place: Narratives of Neighbourhood Change, Market Injustice and Symbolic Displacement.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32(4): 373-388.
Barret A. L and David C H. 1984. Social Differentials in Metropolitan Residential Displacement. In: Palen J J and London B.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and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utler T, Hamnett C and Ramsden J M. 2013. Gentrification, Education and 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 in East Lond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7(2): 556-575.
重庆市南岸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重庆市南岸区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Nan'An District Chorography Compilation Committee. 1993. *Chongqing Nan'An District Chorography*.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rawford B and Sainsbury P. 2017. Opportunity or Loss? Health Impacts of Estate Renewal and the Relocation of Public Housing Residents.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35(13): 137-149.
Curran W. 2007. 'From the Frying Pan to the Oven': Gentrifica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 Displacement in Williamsburg, Brooklyn. *Urban Studies*, 44(8): 1427-1440.
Davidson M. 2009. Displacement, Space and Dwelling: Placing Gentrification Debate. *Ethnic Place and Environment*, 12(2): 219-234.
Eden K. 2020. Re-Encountering Lefebvre: Toward a Critical Phenomenology of Social Space. *Society and Space*, 38(1): 167-186.
Elliott-Copper A, Phil H and Loretta L. 2020. Moving beyond Marcuse: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and the Violence of Un-Homing.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3): 492-509.
Freeman L. 2005. Displacement or Successio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Gentrifying Neighborhoods. *Urban Affairs Review*, 40(4): 463-491.
Fussell E and Lowe S R. 2014. The Impact of Housing Displace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Low-Income Parent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13: 137-144.
Glass R. 1964. Introduction. In: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Gotham Kevin Fox. 2005. Tourism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New Orleans' Vieux Carre (French Quarter). *Urban Studies*, 42(7) : 1099-1121.
Gregory D. 1994.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Grier G and Grier E. 1980. *Urban Displacement: A Reconnaissance*.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何深静, 刘玉亭. 2008. 房地产开发导向的城市更新——我国现行城市再发展的认识和思考. 人文地理, 23 (4): 6-11. [He Shenjing and Liu Yuting. 2008.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The Patterns of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Human Geography*, 23(4): 6-11.]

- 何深静, 刘玉亭. 2010. 市场转轨时期中国城市绅士化现象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地理科学*, 30 (4): 496-502. [He Shenjing and Liu Yuting. 2010. Mechanism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0(4): 496-502.]
- 黄玺. 2007. 重庆南岸滨江区域近代建筑风貌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重庆: 重庆大学. [Huang Xi. 2007.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the Shore of Nan'An District.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 Hubbard P. 2017. *The Battle for The High Street: Retail Gentrification, Class and Disgust*. London: Macmillan.
- Jeffrey R H. 1984. Gentrification and Displacement of the Elderly: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Palen J J and London B.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and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Jones O. 2015. 'Not Promising a landfall...': An Autotopographical Account of Loss of Place, Memory and Landscap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1): 1-27.
- 凯文·林奇. 2001. 城市意象.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Lynch K. 2001. *The Image of the City*. Fang Yiping and He Xiaojun.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Laska B S and Spain D. 1980. *Back to the City: Issues in Neighborhood Renovation*.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刘颖, 张平宇. 2018. 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现象: 概念溯源及研究综述. *人文地理*, 38 (4): 1-6, 145. [Liu Ying and Zhang Pingyu. 2018. Gentrific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 Concep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Human Geography*, 38(4): 1-6, 145.]
- Low M S and Altman I. 1992.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Inquiry*. New York: Plenum Press.
- Marcuse P. 1985a. Gentrification, Abandonment, and Displacement: Connections,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New York City.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28: 195-240.
- Marcuse P. 1985b. To Control Gentrification: Anti-Displacement Zoning and Planning for Stable Residential Districts. *Review of Law & Social Change*, 13(4): 931-945.
- Mazer M K and Rankin N K. 2011. The Social Space of Gentrification: The Politics of Neighbourhood Accessibility in Toronto's Downtown Wes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9(5): 822-839.
- McKinnish T, Walsh R and White K T. 2010. Who Gentrifies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67(2): 180-193.
- Oliver A. 2017. Understanding Place. In: Bruce B Janz. *Place, Space and Hermeneutic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Pain R. 2019. Chronic Urban Trauma: The Slow Violence of Housing Dispossession. *Urban Studies*, 56(2): 385-400.
- 钱俊希, 杨瑾, 朱竑. 2015.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地理学报*, 70 (8): 1281-1295. [Qian Junxi, Yang Jin and Zhu Hong. 2015.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ibe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81-1295.]
- Relph E. 1981. *Ration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Totowa: Barnes & Noble Books.
- Relph E. 2008.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Sakizlioglu B. 2014. Inserting Temporality into the Analysis of Displacement: Living Under the Threat of Displacemen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phie*, 105(2): 206-220.
- 莎伦·佐京. 2015. 裸城: 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丘兆达, 刘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Zukin S. 2015.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Qiu Zhaoda and Liu Wei.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Shaw S K and Hagemans W I. 2015. 'Gentrification Without Displacement' and the Consequent Loss of Place: The Effects of Class Transition on Low-Income Residents of Secure Housing in Gentrifying Ar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2): 323-341.
- Slater T. 2006. The Eviction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from Gentrif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0(4): 737-757.
- Smith N and Williams P. 1986. *Gentrification of the City*. London: Unwin Hyman.
- Sumka J H. 1979. 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and Displacement A Review of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4): 480-487.
- Tuan Yi-Fu. 1971.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nadian Geographer*, 15(3): 181-192.
-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王志弘. 2009. 多重的辩证: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三元组演绎与引申. *地理学报*, 48 (55): 1-24. [Wang Chih-Hung. 2009. Dialectics in Multitude: An Exploration into/beyond Henri Lefebvre's Conceptual Triad of Production of Sp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8(55): 1-24.]
- 沃尔夫冈·卡佛岗. 2014. 重庆往事: 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 1940-1951. 董经绚, 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Kafgang W. 2014. *Once upon a Time in Chongqing*. Dong Jingxun. Trans..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张京祥, 邓化媛. 2009. 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 *国际城市规划*, 24 (1): 43-47. [Zhang Jingxiang and Deng Huayuan. 2009. On the Forming of Consumer Space in Modern Urban Historical & Cultural Areas—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4(1): 43-47.]
- 张平宇. 2004. 城市再生: 我国新型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城市规划*, 28 (4): 25-30. [Zhang Pingyu. 2004. Urban Regene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8(4): 25-30.]
- 赵玉宗, 顾朝林, 李东和, 黄明丽. 2006. 旅游绅士化: 概念、类型与机制. *旅游学刊*, 21 (11): 70-74. [Zhao Yuzong, Gu Chaolin, Li Donghe and Huang Mingli. 2006. Tourism Gentrification: Concept Type and Mechanism. *Tourism Tribune*,

21(11): 70-74.]
朱竑, 钱俊希, 吕旭萍. 2012.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地理科学, 32 (1): 19-24. [Zhu Hong, Qian Junxi and Lv Xuping. 2012. Place

Identity and Sense of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2(1): 19-24.]

The Spatial Experience of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in Xiahao District, Chongqing, China

Xu Yi^a and Liu Su^{a,b}

(a.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b. Institute of Western Marx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focus on material spaces to spatial experiences within the field of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the lifeworld constituted by daily experiences was the fundamental starting point of this study. Daily experiences as such do not only refer to unconscious universal experiences but also contingent ones, so that the lifeworld at issue is a field of care as well as a field of suffering simultaneously, within which both rootedness and rootlessness are concerned. Therefore, the field of displacement integrates into the frame of Lefebvre's spatial tria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lifeworld at issue is manifested as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nd spatial practice. The lifeworld, as a pivotal concept of phenomenology, as well as the spatial triad can both be seen to merge into the field of displacement and further indu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cus from direct displacement to indirect displacement, which regards daily experiences as its base. Meanwhil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local symbols, within which local agencies act and react, has been adopted in this study field as an effective spatial practice in the produc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spac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as one side of the spatial triad tends to be regarded as the opposite side of spatial representation, in many cases, and both are linked by spatial practice. Within the frame of spatial triad, this study mainly concerns the experiences of lifeworld stemming from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locals' practi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in question, the authors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gentrification-displacement experiences in the Xiahao community of Nan'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which is a very typ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 confronting displacement by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n addition, another item by Lefebvre, "social space," was also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o place a stronger emphasis on hierarchical social groups catering for this case study on recognition, action, and emotion at a local level.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d two main aspects. First, the displacement experiences were demonstrated by distinguishing the features within three main social groups: residents, migrants, and tourists. (1) Residents' experiences comprised the loss of memories related to their own families' life history in the long term as well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routine of intim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neighborhood. (2) The displacement experiences of migrants were manifested as the loss of a free lifestyle that was far removed from the lifestyle of metropolises. (3) The displacement experiences of tourists were illustrated as the loss of an authentic place where these people could conduct their own authentic experiences based on nostalgia. Second, within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 migrants'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inside authentic space and the outside commercial space, thereby provoking the arrival of numerous tourists in the community, resulting in long-term indirect displacement. Along with the prominent activities of migrants, an outside capital logic was thereafter involved in this community, leading to a completely irreversible transformation as a commercialized space.

Keywords: gentrification; displacement; phenomenology; Lefebvre; representational space; Chongqing